

论现代竞技体育发展的工具理性内涵

宋亨国¹, 王新²

(1.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民族体质与健康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006;

2.新疆喀什师范学院 体育系, 新疆 喀什 844000)

摘 要: 工具理性是西方工业文明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 现代竞技体育作为人类工业文明的重要产物之一, 自然也深受其影响: 一方面, “利益空间”的不断生长和设定, 使竞技体育成为各类参与者的特殊工具; 另一方面, 在竞技体育“工具化”发展趋势下, 各种显而易见的矛盾和冲突始终伴随着其全球化进程。

关键词: 体育社会学; 竞技体育; 工具理性

中图分类号: G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09)12-0023-04

Discussion on the connotations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ompetitive sports

SONG Heng-guo¹, WANG Xin²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2.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Kashi Teachers College, Kashi 844000, China)

Abstract: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refers to a philosophical ideology having a dominating position in west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Modern competitive sports as an important product of hum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is of course affected profoundly by such a philosophical ideology: on the one hand, the “space of interests” is constantly expanded and set, which makes competitive sports a special instrument for various participants; on the other hand, under the trend of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 sport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nstrument like, various obvious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have gone through the entir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of competitive sports.

Key words: sports sociology; competitive sports;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最初提出“工具理性”这一概念的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M·韦伯^[1]。工具理性也称“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 是西方文化传统理性思维以及重视经验和自然的哲学传统的具体产物。西方启蒙理性的发展高扬了工具理性, 而伴随世界范围内的科技革命, 人类开始极端推崇工具理性, 由此使人类社会或在局部或在一定地域内进入深刻的发展矛盾中。一方面, 在工具理性的推动下, 人类社会生产力和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 进一步塑造了“人类的绝对话语权”, 科学技术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载体。但与此同时, “工具理性(科技理性)所倡导的对自然缺少人文价值关怀的征服引发了一系列对人类命运产生不良甚至致命影响的全球性问题。比如, 在人与自然关系

方面导致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 在人与社会关系方面, 导致了贫富分化的悬殊, 社会结构的失调, 个人本位的膨胀等; 在人的精神生活领域, 导致了拜金主义的盛行和道德滑坡等”^[2]。

“工具理性”作为工业文明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 自然也深刻地影响着竞技体育的发展。100余年的发展中, 它的工具性历程从未间断, 尤其是在其全球化态势形成之时, 又以各种隐性和显性的特征扩展到世界范围, 并通过各种利益群体的实践以具体的结果表现出来。

1 竞技体育“工具理性”的基本内涵

论述这个问题前, 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前提, 即

竞技体育的工具性以价值理性为基础。因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互为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如果一味强调和追求工具理性就极易造成人性扭曲。“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也称“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它不仅是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而且是一种目的理性、批判理性、建构理性和信仰理性。价值理性为体,工具理性为用,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的存在提供精神动力,指引着工具理性活动的方向。当理性与竞技体育价值交融而凝成独特的价值理性时,便获得了新的质的规定,便成了区别于工具理性的具有独特意义的理性——既指向竞技体育发展的终极目标,又指向竞技体育的现实发展,其中凝结着人类文明对竞技体育的历史作用结果。因此,竞技体育的“价值理性”就是体育实践者遵循体育之精神内涵,即是否实现了体育所要求的公平、公正、团队、竞争超越等行为品质。它并不看重所选择体育行为的结果,而是各类主体的人格完善。回顾百余年的发展,竞技体育从地域、民族走向世界的实质就是其精神价值契合了时代的发展,为人类的发展确立了正确的社会价值取向,这本身就是其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过程。顾拜旦早就指出:“正如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胜利,而是斗争;不是征服,而是奋力拼搏。”^[1]《奥林匹克宪章》也指出:“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均衡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其宗旨是:“通过开展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并按照奥林匹克精神——以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比赛精神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和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这些精辟的论述,都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了竞技体育文化的基本内涵,就是为人的均衡发展提供一种自由境界。这种自由,一方面以充满人文精神的体育运动为全人类构建起一座能够实现友谊联结的桥梁,并提供一种以奋斗、尊重基本公德为基础的全新生活方式。正如国际奥委会第4任主席埃德斯特隆所说:“奥运会无法强迫人们接受和平,但是它为全世界的青年人像亲兄弟一样欢聚一堂提供了机会。”^[2]另一方面,为体育参与者精神升华提供借鉴和实现的平台。因此,在真正的竞技体育精神世界中,既不存在任何分裂对抗和强权压制,也不存在什么超越主体范畴的更高原则,体育主体作为概念,只是道出了人作为本体在竞技体育社会中存在的一种自由状态。

以价值理性为基础,再论述竞技体育的工具理性内涵就有了足够的精神和现实动力支撑。工具理性的核心是对效率的追求,在韦伯的理论中包含着两重含义:一是指目的——手段理性;二是体现为一种行使理性的含蓄性质,而不论是否含有手段——目的程式。

现代竞技体育诞生并发展于“工具理性”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工业文明中。一百余年来,不论文化架构,还是发展秩序、运行机制都深刻体现出这一核心理念。

第一,竞技体育作为人类实践的对象,自诞生之初就具有了一定的“工具性”,即竞技体育作为一种实践对象,不仅表现为客观存在的有用性,而且表现为不同主体之间的有用性。这种交互的客观有用性,使各种体育主体相互联结,共同存在于体育实践过程中,彼此以“合目的性”状态成为他人的目标或工具。这样,不同的体育参与者就具备了一定的工具价值,并表现出很强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在手段——目的的发展逻辑中,当代竞技体育获得了属于自身,当然也属于各种主体的工具性内涵,不同的参与主体根据各自的利益投入到竞技体育之中,采取各种“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获取利益的最大化。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种景象,在竞技体育“合法”理性的外表下,总是顽强地表现出难以控制的非理性来。这也正如马克思^[3]所说的“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每个人只有作为自我目的(自为的存在)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手段(为他的存在);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把自己当作自我目的才能成为手段。”

第二,在工业大生产时代,西方主流价值观和思维模式成为竞技体育存在的基本范式,其发展过程的“工具化”特征也深刻体现出来。“个性至上”、“理性至上”、“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等是现代竞技体育产生的思想基础,尤其是在社会变革深入的时候,这些思想基础又以更为现实的途径构建起竞技体育的发展体系。这一过程的根源在于人类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取向等不断作用到竞技体育文化机体中,并在各种外力的作用下,使原有的价值空间被不断设定,如权力、经济、科技、政治、市场等空间。这些价值空间在设定之初,就已经被人为地划分出不同的主体,并“合法地”认定了等级,规定好他们的行为模式、权利与义务,这样就造成了体育主体“合目的”倾向的最大化趋势。但这些价值空间并非是静止不动的,它时时刻刻处于不断的颠覆和重新设定中。各类利益群体在可能的条件下不断扩张着所属的价值空间和影响力,他们或积极或“迫不得已”地采取各种充满丰富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实践手段。这样一来,原有的利益格局被不断打破,竞技体育也“自然而然”地被纳入到了“不断调和矛盾”的发展轨道上。当竞技体育权力空间、经济空间、政治空间极大拓展时,所属主体相互联结,共同构成了竞技体育发展的历史实践者,

于是就产生了竞技体育商业化、职业化、市场化、法制化发展的抉择。这些合力的交互作用，在使竞技体育成为一种强势文化系统的同时，也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出现了与主体分离的趋势，因此产生了各种危机。以奥运会为例，伟大的权力和经济空间不断改造着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居功至伟或“至高无上”的国际奥委会是核心权力组织，随着奥运会全球化影响的深入，其权力空间在不断扩大；奥林匹克营销计划，即著名的“TOP”计划开启了奥运会整合全球资源的历程，其经济、市场空间成为常人难以涉猎“高端产物”；而寻求国际政治和举办国政治的支持，又使奥运会始终左右于“政治化和非政治化”的两难境地之中。毋庸置疑，利益空间的不断生长是竞技体育全球拓展的重要资源，但不能忽略的是，这一过程并不是那么“纯粹”，其中夹杂着发展逻辑的变换或置换，这就使竞技体育的价值冲突和利益掌控呈现出集中化和复杂化的趋势。而当竞技体育从科学技术中寻求发展逻辑之时，参与主体的任何实践活动也在“大同”的模式中开始遵循技术的自律逻辑，“技术理性”也成为了竞技体育所遵循的主要原则。凸显其价值理性的主体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一种工具性的存在，从而也成为一种客体和手段，这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现代竞技体育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体系。

第三，当利益空间大规模延伸和拓展时，整个竞技体育就成为有机联系的系统，各类主体具有了明确的分工，当一类群体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必然要为其他群体利益的实现做出贡献。所以，在整个体育实践过程中，各类体育参与者都在客观上具有了满足他人需要的工具性价值，这成为竞技体育发展所遵循的一个基本规律。由于分工的客观存在和细化，参与者也成为整个竞技体育发展所需要的工具，尤其是当体育主体不断产生新的需要时，又以积极的姿态促成新一轮的分工。今天，体育主体的利益已经上升到国家和民族主体层面，这些主体无法回避当代竞技体育的伟大影响力，开始挖空心思地采取各种方式和风格去构建以体育为平台的民族发展契机。于是，各种传统、民族的资源有了走向世界的新的平台，并上升到象征领域的高度去寻求获得一种“现代化”的身份。这种利益联结能力的广泛提升，使竞技体育的目的化倾向更加突出，不同身份的人群成为了体育主体，开始疯狂瓜分和占有原本已经拥挤不堪的利益空间。由此当代竞技体育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悖论之中，多元主体在拓展体育发展空间和平台的同时，又重新制造出各种“利益空间”，使自身可能成为“异化了的对象”。竞技体育在我国的发展就呈现出这种独特性。就整体

发展而言，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不论是在规模上还是资源投入上都能够利用“举国体制”这一利器快速实现各种社会资源的整合。但就现实情况而言，这一整合过程始终伴随着一系列的阵痛：体育体制、体育权力格局的更迭和变换，各种权力主体进一步分割着的拥挤空间；旧有的发展秩序被不断颠覆，新的秩序始终处于孕育之中；竞技体育体制改革、部门改革、法制化发展的呼声日渐强烈等。由于新发展秩序有效性的缺失，体育人茫然不知所措，他们既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由此造成了体育价值观、体育发展观、体育道德观的失落和混乱。而与此相应的是，在多重权力主体的运作下，竞技体育市场产生的经济空间已然被事先划定，各种主体利用“合法”身份采用各种“非常手段”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身份是法律和国家权力机关赋予其的法律地位，表现出当然的合法性；而非非常手段则表明中国竞技体育经济秩序的缺失，无法采取常规性的运作手段，表现出或然的非法性，这样就出现了令人迷惑的现象，在利益产生后面临诸多分配主体，“不公”成为各级或各类主体的共同诉求，各种围绕此种情况产生的难题也层出不穷，无法调和。这些都使中国当代竞技体育在不断的震荡中努力地寻求着新的发展路径。

2 竞技体育“工具理性”带来的消极影响

近些年，随着竞技体育工具性价值的日渐凸显，越来越多的主体投入到了对竞技体育工具价值的恶性追求中，各种“异化”现象也应声而至。

第一，体育主体的否定性弱化了。人与动物和其他物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人是一种永不满足的存在物，是一种对现实进行不断否定的存在物。动物和其他存在物满足于自然给予它们的本质规定，它们永远不能超越自己的本性。今天的人类更加具有智慧，但也更加具有多样的需求。当竞技体育成为满足人类需求的存在物时，一些体育行为者也想当然地具有了一定的“工具性”，这种工具性使体育主体不断超越自我，拓展着他们获得更多利益回报的美好愿望。但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因受自身“工具性”的辖制，他们不得不要首先成为其他主体的“存在物”才能够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样屈从于“工具价值”身份就成了无力改变的基本状况。运动员在今天竞技体育的联结中具有关键性的地位，各种资源的有机整合都是为了提高运动员的竞技成绩，这一过程本无可厚非，但当运动成绩和“利益”紧密联系时，多数运动员便成为了某种实验品或牺牲品，为了获取“世界认同”，大量运动员成为“铺路石”，丧失了基本的“话语权”，

而当这种认同成为现实时,他们又被无情边缘化,成为“合法的淘汰者”。

第二,参与者的主体性被物化了。主体性是人的本质规定,它决定着竞技体育的发展,但当竞技体育被过度工具化了的时候,体育主体也成为了改造对象,主体性被物化在利益实现中,主体性价值也逐渐被湮没了。一方面,在对竞技成绩的绝对追求中,很多运动员丧失了全面接受教育的权利,使他们在退役即面临“淘汰”的悲惨境地;另一方面,当代竞技体育过度的职业化、商业化趋向,“不可避免地玷污了竞技体育的神圣,导致竞技体育服从于商业利益……竞技体育的参与者及相关人员屈从于利益的获得和分配,并为此不择手段,歪曲了健全的人格”^[6]。为此,何振梁撰文指出:“奥林匹克对职业运动员开放可能导致奥运会失控”,“过度的商业开放带来了现实和潜在的威胁……滥用兴奋剂的根源是商业化(或政治)的考虑。它对奥林匹克起着消极的作用。它违背了体育的根本目的,损害了运动员的健康。”

第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竞技体育发展秩序的混乱。体育主体的工具性,以及主体性的过度物化使竞技体育的发展秩序始终处于摸索的调适之中。体育主体作为一个类存在的基本前提就是以竞技体育为平台而产生了良性联系。但是,由于各种主体对工具价值的过分追求,使自身也成为了一种物性的工具^[7-8],各类主体发展的个体差异性被极端的利益追求所代替,体育主体间的情感交流也被极端的行为取代。兴奋剂、球迷骚乱等就是这一工具性带来的恶果。为了在激烈的高水平竞技中获得一席之地,个体差异已经不再重要,“先进药物和技术”的刺激使竞技体育充斥着“另类”科技的较量;而球队、球迷间良性的情感交流也因为主体情感需求的过度扩展成为了没有感性支撑的纯粹利益,各种由此引发的情感爆发以极端方式宣泄出来,因而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性。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作为一个对立统一的范畴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发展历程中必然要遵循的基本逻辑。竞技体育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逐渐从地域走向全球,从民族走向全人类。在此过程中,其精神层面所蕴含的符合时代特征的表现理性,迅速拓展到人类的现实生活中,为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理想家园”。但同时,随着其全球整合能力的不断提升,各种资源也无孔不入地进入其中,并以自身的逻辑不断影响着竞技体育的发展。由此造成了竞技体育利益空间的重新划分和分配。尤其是在人类由工业化时代转入信息化时代的历史时期,竞技体育的发展进一步出现了价值观混乱,工具理性凌驾表现理性,主体地位不断弱化的消极状况。

参考文献:

- [1] 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2.
- [2] 曾冬梅, 邱耕田. 走向融合: 新时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发展趋势[J]. 学术界, 2002(5): 11-14.
- [3] 任海. 奥林匹克运动[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93: 128.
- [4] 金元浦. 大学奥林匹克文化教程[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144.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196.
- [6] 李龙, 陈中林. 现代竞技体育文化的和谐内涵[J]. 体育学刊, 2007, 14(2): 41-44.
- [7] 陈淑奇, 龚正伟. 竞技体育异化与运动员权益保障问题之伦理审视[J]. 体育学刊, 2009, 16(1): 19-23.
- [8] 孙玮. 竞技运动中人的生命观[J]. 体育学刊, 2007, 14(8): 20-23.

[编辑: 李寿荣]